



JIDUJIAO YU
DANGDAI ZHONGGUO DAODE JIANGOU

基督教与当代 中国道德建构

李灵 魏德东 / 主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基督教与当代 中国道德建构

李灵 魏德东 / 主编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教与当代中国道德建构 / 李灵, 魏德东主编. —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188-0618-8

I. ①基… II. ①李… ②魏… III. ①基督教—关系—道德建设—中国—文集 IV. ①B978-53②D64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01707 号

基督教与当代中国道德建构

李 灵 魏德东 主编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358(编辑部)

责任编辑: 袁 珂

版式设计: 贺 兵

印 刷: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版本记录: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13.75 印张 300 千字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88-0618-8

定 价: 7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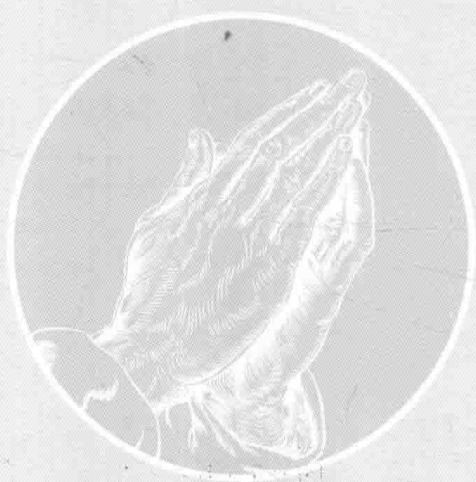
主编简介

李灵

哲学博士，美国洛杉矶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总干事，《中国基督教研究》总编。

魏德东

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导师，国际佛学研究中心主任。



序一 基督教与当代道德重建

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总干事 李 灵

2015年11月7至9日,中国人民大学举办了“基督教与中国当代道德建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的举办本身就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开放与自信。这是经过35年改革开放之后才有的文化气度。

这种气度反映了一个事实:多元化已是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看当代中国的道德建构,基督教必然有其责任和使命。

当代中国道德现状

有关国内的道德现状,学术界近几年曾对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道德状况作过田野调查,下文借助其成果作一简单描述。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政策开始落实;至九十年代,社会道德问题就引起学术界的关注。1999年,浙江大学王东莉副教授发表《社会变迁对青年道德状况的影响》,指出:“当代中国青年的道德素质的状况表现为:道德主体意识不断增强;道德功利性日趋明显;道德价值观呈多元化;道德冲突与困惑加剧;道德评价更具宽容性。”

当时新旧道德观念的冲突有日趋严重的趋势。王教授认为:“这种状况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当代中国青年面对传统与现代的交锋,中西文化、道德观念的冲突,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影响的结果。旧的传统受到了冲击,新的有效的道德规则尚在建设之中,因此社会和道德在一定的程度上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

学术界对社会道德讨论、研究的高潮为2012年。该年全国报刊刊登了多

篇专文,其中特别令人瞩目的,是以秋石署名在《求是》杂志连载的三篇文章:“正确认识我国社会现阶段道德状况”。所谓“正确认识”就是“要从肯定社会道德主流的前提下看待一些不好的案例,要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暂时出现的负面现象,要从总体上取得进步的角度看待个别倒退现象,总之,看到问题不能否定成绩”。从另一个角度看该文,可体会道德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否则不用担心人们会“否定成绩”。

2012年1月出版的《中国伦理道德报告》,提供了全新的视野。这是东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樊浩教授领衔的科研项目。该报告的可贵,在于运用了社会学方法进行田野调查,数据详细,对于社会各群体的伦理关系、道德生活、伦理道德素质所作出的评析有客观依据,极有说服力。

同一时期,另一项由樊教授领衔的科研项目《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从“意识形态”更深的层面,解析当代社会道德变化的原因。该书前言说:“本书是以当前我国思想、道德、文化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和规律的调查研究为基础,对思想、道德、文化三大领域中的‘多’与‘一’、‘变’与‘不变’进行调查研究,形成我国大众当代意识形态状况的研究报告和数据库,是非常难得的系统全面地了解当今我国诸社会群体大众意识形态状况及其发展规律的调查研究成果。”作者的基本结论是:“多元”却有点混乱、“发展”却没有方向、“评价”又缺乏依据、“原因”很难深究。

基督教对当代道德重建的作用

1. 自觉的约束力

基督教信仰强调个人和上帝的关系;宗教戒律被内化为个人的道德约束。如此,信仰和道德不仅一致,而且还成了个人的道德自觉基础。所以,就信仰的要求来讲,基督徒无论置身何处,是只身一人还是处于群体之中,道德和行为都应维持不变。圣经教导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为上帝作见证,“为主而活”。从这个意义上讲,基督徒的“知耻”,是因为感觉到“亏欠了上帝的荣耀”。

基督教既然能够使个人的信仰内化为道德的自觉,因此对于中国当代的道德重建,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2. 普遍戒律和个人自由

如同所有宗教一样,基督教也有普遍戒律来约束所有的信徒。但是,作为个体的信徒却并不因此而失去自由。因为基督徒重生得救后,虽然仍在肉体中生活,看来与他人无异,但内里却有一个新的属灵生命,来主导他的行事为人。使徒保罗曾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哥林多前书 9:19)这种崇高的道德观,就是由此而来。

改教家马丁·路德曾提出两个看似完全矛盾的命题: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众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辖;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众人之仆,受任何人管辖。此说的重点为:“我们先揣摩这一个里面的人,看一个义的、自由的、真正是基督徒的人,那就是说,一个新的、属灵的、里面的人是如何来的。”他说:“一件事,只有一件,是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的义与自由所不可少的。这一件事就是神的圣道,基督的福音。”

马丁·路德认为:“灵魂缺少别的都不要紧,但少不了神的道;没有神的道,灵魂就无处求助。但灵魂若有了道,生命就是富足的,不缺少什么,因为这道就是生命的道,就是真理、光明、平安、公义、拯救、喜乐、自由、智慧、能力、恩典、荣耀以及我们所想象不到的诸般好处的道。”他的根据是约翰福音 11:25:“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以及 8:26:“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并马太福音 4:4:“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基督徒内在的属灵生命,因着“道”的缘故而富足并自由;外在的表现就是能有道德自觉的行为。以上所提保罗“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这样的美德就出现了。基督徒因着信仰,不仅行为上能守住普遍戒律中被动的一面,同时个体生命更有感到全然自由的一面。

在当代道德重建中,基督教信仰确实能帮助个体树立道德自觉,对社会也能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3. 基督教的超然性和现实性

耶稣基督在世上最后与门徒相聚时，曾这样为他们祷告：“我不求你（神）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于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约翰福音 17：15—16）简言之，基督徒是一群活在世上却不属于世界的人。如此就奠定了基督徒对世界的态度：既现实，又超然。

人活在世界上，都必须面对现实。但是基督徒因为有永生的盼望，并不单单关注这世上事。为了能经得起末日的审判，在天上得到接纳，信徒在世上的每一天必须有美好的生活见证。这就决定了基督徒对现实世界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在生活中相对超然了些。

道德重建所面临最重大的难点之一，就是如何重新树立人们对精神世界的向往和追求，如何建立对世界名利的超然意识。对那些深陷物质利益而不能自拔的人，基督徒“活在世上却不属于世界”的人生价值观，无疑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基督徒的生存虽不能脱离现实，但却不局限于现实；基督徒的生活虽不能没有物质支撑，但却能不成为物质的奴仆。基督徒对永生的盼望，是他们能够不为现实世界和物质利益所奴役的根本原因。

总而言之，基督教在当今中国道德建构中不仅不能缺席，而且还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基督教的中国化最终将使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有利于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也是每一个基督徒义不容辞的责任。

序二 基督教有助于中国道德的建设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何光沪

对当代中国道德建构这个话题，相信大家深有感触，甚至为此痛心疾首。我们开会的这个会场，位于中国人民大学的“明德楼”。大家知道，这个名字源于“四书”里面《大学》的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亲民”也作“新民”。“新民”，就是改变人心，让旧人变成新人。

我讲三点：第一点，今天的话题是“现代中国道德”，我想讲它滑坡的病根；第二点，讲现代中国道德康复的药方；第三点，讲现代中国道德建构的能量。

一、现代中国道德滑坡的病根

这个“现代”，从世界史来说，是起于英国革命，从中国史来说，是起于鸦片战争，从此以后，中国开始走上现代化之路，到现在没有走完。所以，我追溯中国道德腐烂的病根，可以从清朝末年说起。

关于清朝末年的状况，可算是来华头号传教士的戴德生（James Taylor）有一个记录。他有一次在南海上航行，看见一条渔船翻船沉没，很多船员落了水。他看见旁边还有其他一些渔船，心想：好了，现在可以救人了。然而令他震惊的是，其他船上的渔民竟高声问道：“给多少钱？”现在这一类报道很多，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但是实在没有想到，戴德生当年也见过这种事情。于是我想，他后来说“即使有一千条生命，也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真不容易！

刚才提到鸦片战争，鸦片战争正在进行时，英国军舰攻破了虎门炮台，溯

江而上，清军溃不成军。但是，站在江边有成千上万的中国民众，居然指指点点，像看马戏似的！看见清军落水时，他们还发出像看戏看到精彩处的那种嘘声！英国司令官大为惊讶，问中国翻译是怎么回事，中国民众怎么会有这样的态度。翻译回答说：“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

我们都知道，龚自珍属于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一位“先进的中国人”，他当时的评论是：“官无廉官，吏无能吏，军无良将，兵无勇士，民无良民，盗无侠盗。”关于“民无良民”或大众道德状况，戴德生的经历只是一个佐证，那么，根源何在呢？龚自珍的儿子给出了一个回答。他叫龚半伦，做了所谓的买办，又帮外国人做向导、做翻译。在同清朝政府谈判的时候，他面对的是恭亲王——恭亲王是中国政府的代表，而他代表的却是外国政府。当时恭亲王骂他说：“你等世受国恩，却为虎作伥！”按现在的说法是，居然做汉奸！龚半伦回答说，“我等本是良民，上进之路被尔等堵死，又处处有贪官盘剥，才不得不乞食于海外！你骂我是汉奸？我看你是国贼！”

我们的确应该思考一下这些问题。所谓道德滑坡，不自今日始。当然我们还该看看民国时期。在民国初年，民风初开，杰出人物层出不穷，其中的佼佼者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刚才提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他办《新民丛报》就是这个意思。他还写了《新民说》，说我们要搞道德革命，今日中国第一要务，就是“新民”。这是这位所谓保皇派的主张。那么激进派又如何呢？傅斯年、鲁迅这些人又如何呢？傅斯年办杂志，鲁迅为之撰稿，杂志叫《新潮》。《新潮》也主张伦理革命，也就是道德革命；“发刊词”论其宗旨曰：“我们要造成战胜社会，而不为社会所战胜的人格！”还有，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或重要人物何叔衡、蔡和森、毛泽东等人，他们在湖南办的“新民学会”，也提出以改良人心为宗旨。最后，应该提到新儒学，其重要代表贺麟先生说，新儒学要改造人心，“必须要吸取基督教的精华”，来充实儒家的礼教。

这就涉及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涉及很重要的、长期被忽略的基督教的说法及其成果。我们只需提提以晏阳初为代表的基督教知识分子，以及他们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成果。晏阳初说：中国贫弱，其罪不在清朝；“民为邦本”，民心坏了，国怎么能富强呢？今日最急需的，不是练兵，不是办学，不是开矿，也不是革命；我们全国上下，最急需的就是“革心”，把自私自利的心革

去,换一个公心;有新心而后有新人,有新人而后有新社会,有新社会而后有新国家。下面这句话更有意思:咱们中国人得了“心病”,要医心病,非请“神医”不可!换句话说,医治心病,非得宗教不可。

对他这些话,我有一点点不同意——国家的富强应该是手段,人民的富强才是目标;国富强而民贫弱的事情也很多。但是对他最后一句话,我特别感觉深刻——要医心病,非请神医不可!晏阳初虔信基督,他以基督教的理念,在河北定县农村办学校,推广农技,办医院,增进健康,更注重培养农民的“公心”;结果,日本军队攻定县,攻了七次也才只占住铁路沿线,因为农民都起来抵抗,而且晏阳初学校的老师管理着农村地区!

孔子最好的继承人孟子也说出了同样的道理——孟子谈到鲁国攻打邹国,邹国兵败如山倒,邹国的老百姓却在一边幸灾乐祸的原因,他说:你这个邹公,邹国的国君,丰收的时候搜刮百姓,把粮食屯起来,受灾的时候你看着百姓饿死也不管;这国家既然只是你的,那么它的生死存亡,与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孟子说出了这个问题的症结,说出了这个事情上“道德滑坡”的病根。

二、现代中国道德康复的各种药方

有何药方呢?我们还是回顾以往,查找古书!在中国的古书中,你似乎可以找到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所谓“五常”,意思是这五条永远适用,具有普世的价值。还有道家讲的“慈”——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慈爱是道家推崇的概念。还可以在佛教中找到“慈悲”——“与乐为慈,拔苦为悲”,与乐就是要给人幸福快乐,拔苦就是要让人脱离苦难。这些是我们在古书和宗教里所能找到的药方。当然,书本归书本,实际归实际,这些概念怎么应用,尤其在现代社会里怎么应用,没那么简单,还得研究!比如,儒家思想依托的宗法社会结构,血缘社会和熟人社会已经被“陌生人社会”所取代,旧的社会结构已经不可能恢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必须重新研究!

中国现成的其他宗教,也包含一些药方。比如伊斯兰教,它也有类似的说法,它提到真主,总要说是“至仁至慈”。基督教也是中国宗教大家庭的成员,它说上帝就是爱,要大家“爱人如己”,当然也算一个药方。由于它是今天

会议的主题,我们必须多谈一谈。那么,基督教的药方,对现代中国的道德建构有什么用处?关键是,这药方在实际上,在“道德建构”这种复杂艰难、旷日持久、规模宏大的事业中,能成为真正起作用的能量吗?这是我要讲的第三点。

三、现代中国道德建构的各种能量

在西方世界,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灭亡以前的文明,被称为“古典文明”。古典文明继承了非洲的埃及、亚洲的美索不达米亚和腓尼基、欧洲的克里特和迈锡尼等上百个民族和国家的上古文明,最后以希腊城邦和横跨三大洲的罗马帝国为代表,硕果累累、辉煌灿烂。

但是,这个文明得了癌症——同人体癌症的病理一样,构成罗马社会的个人,一个一个地大量地腐败、变坏!在罗马帝国后期(甚至从罗马共和国后期开始),贫富悬殊、国富民穷、改革受阻、暴力盛行已难以逆转,人性由此而受到极大的腐蚀——奴隶当然不用说,隶农和无产者的贫困同贵族的富有形成尖锐的对比,结果一边是仇恨,另一边是奢靡;国家经常大兴土木举行豪华的庆典,而农民却长期失地。贫民靠偷窃和告密为生的同时还以罗马的富强为荣,结果一边是狂躁性人格,另一边是自卑性人格;格拉古兄弟俩为改革而死,戴克里先“改革”难挽颓势,结果是绝望蔓延和自我中心盛行;帝国对外对内都靠武力,经常举行的角斗士表演以人与人、人与兽的厮杀作为娱乐,结果是对生命的轻贱和普遍的冷酷残忍!

希腊罗马的宗教对人没有任何道德要求,诸神没有任何比人高尚的地方。所以在古典文明后期,人性的败坏日益严重——罗马到处是奢华的浴池,很多贵妇人竟把自己的名字列入妓女名单,因为这样通奸就可以同男人一样不违法;政治家带头破坏婚姻的严肃性(例如安东尼和克柳帕特拉在埃及卿卿我我,回到罗马就结婚,过了两月又离婚,回到埃及再与那“艳后”住在一起);皇帝上台原来靠选举,后来则靠阴谋靠暴力。贵族们只管家事,不管国事;商人(骑士)们只顾发财,不顾其他;甚至工人不愿做工,农民不愿种地,父母不愿生孩子,大家都不愿当兵!北方有日耳曼蛮族,人民大众宁可搬过

去与之同住；蛮族入侵时，他们则去带路，去起义，去帮助对方打罗马！罗马屡遭蛮族攻破、劫掠，老百姓竟然把那辉煌的城墙拆掉，另建自己居住的小城城墙！一句话，古典文明的确患了癌症，病入膏肓！

然而，另一方面，大家知道，罗马开始实行帝制之后不久，在公元一世纪，基督教诞生了。由于它作为重要的精神力量，对道德腐败有矫正作用，对社会矛盾有调节作用，对社会冲突有缓解作用，所以它帮助延长了古典文明的寿命。重要的历史学家，《世界文明史》作者威尔·杜兰特用大量的史料证明，基督教发挥了巨大的影响，抑制了那些使得罗马衰亡的因素，使之延续了将近五百年！

当然，正如汤因比用大多数人类文明的历史所证明的，任何文明的死亡都是由于自身的病症、内部的腐烂，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最终也由于病入膏肓而死亡。但是在此之后，在古典文明的废墟之上，在一片更大的土地之上，在逐步混血的各族之中，基督教却创造了崭新的文明！最终有助于改善社会的风尚（例如烙刑、十字架刑、堕胎弃婴、男女犯人同监、角斗士表演等恶法恶俗的废除，都是一些皇帝信奉基督的结果）。终于，到了公元九世纪前后，造成了“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条件，于是，蛮族的野性逐步得到“软化”，目不识丁只会打杀的武夫，被驯化成了彬彬有礼见义勇为的“贵族”，古典时代的文学、哲学，各种各样的艺术、学术，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最后带来了文艺复兴的群星灿烂、前所未有的崭新辉煌……因此，西方文明被称为“基督教文明”，就像南亚文明被称为“印度教文明”，西亚北非文明被称为“伊斯兰文明”，中国文明被称为“儒家文明”一样，里面有一种基本的、深刻的道理。

古典文明腐烂灭亡以后，西方文明先是从废墟中崛起，而后表现出惊人的生命力和创新力，蒸蒸日上、日新月异，再以后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转变为我们所看见的现代文明，其成就超过以往任何时代并居于全球领先地位。这种文明崛起的生命机制，这种精神源泉，全都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全都同基督教有密切的关系。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变化，给我们的历史启发，无论怎么形容都不过分。其中一个重大的提醒，就是基督教对道德建构来说，可以发挥一定的正能量。

了解了这段大历史，很多人希望基督教帮助延续古老的中华文明。从基督教的性质来看，它是有可能作为正能量发挥一定作用的。

这不但是因为它讲的爱，同儒家讲的仁、道家讲的慈、佛家讲的悲，都是相通的；更重要的是，它的提倡有更深的根基和更高的目标，因为它信仰超越的上帝。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谓“心意更新”，就是做“新人”。基督教教人做新人，就是改变一个一个异化的人。这就是它作为宗教的功能，所以古典文明先是得以延续，在其死亡之后，它又逐步造成了新的文明，即所谓西方文明或基督教文明。正如好细胞多了，可以使人身体健康，一个一个的人变成新人、好人，好人多了，就可以使社会逐渐变好。《罗马书》这句话说到神的“善良”即 good，就是要人效法神而“变好”；“纯全”即 perfect，就是要人效法神而成为“完善”，“可喜悦”即 acceptable，“可接受”。要明白什么是好，什么是完善，什么是神可以接受的。

很奇妙，恰恰我们今天开会的地点，这幢大楼的名字就叫“明德”。明德之后是“新民”，就是要改变一个一个的人，要人变好；“止于至善”，就是要人变得完善。这件事情，恰恰是基督教所要做的。基督教中国化的基础，端在于此。

目 录

序一 基督教与当代道德重建	李 灵 1
序二 基督教有助于中国道德的建设	何光沪 11
宽容的力量:爱的平凡和伟大	赵敦华 1
基督宗教与社会和解	孙 毅 6
基督宗教德性伦理学及其对现代中国道德建构的意义	
——以托马斯·阿奎那为中心的探讨	梁卫霞 13
走出道德的困境:施莱尔马赫的现代宗教之路	
——兼论对基督教与现代中国道德建构的启示	朱云飞 25
宗教改革经济伦理之原貌与当代中国社会	曾劭恺 42
中国基督徒的性伦理与圣经文本关系	
——《天风》杂志为例探讨性伦理与圣经文本的关系	
(1983—2013年)	王志希 55
圣经接受史视野下的亚伯拉罕	
——以郭实猎与理雅各布布的圣经人物传记为例	张雅斐 74
文化激进主义者陈独秀与现代新儒家贺麟对基督教道德的	
吸收	孙尚扬 91
明末以来的十架叙事	韩思艺 104
清末教会女校之研究:以东方女子教育促进会为中心	
(1844—1899)	尹翼婷 122
从撙节机构名称及要旨的演变看基督教对中国近代道德	
的影响	马光霞 146

论基督教青年会对近代中国社会道德的培育与推动

——以广州基督教青年会为例 郑利群 158

基层基督徒伦理道德的几种表现形式

——以近年来的调研为基础 段 琦 171

基督徒的教派归属、宗教性与性伦理道德意识 赵星光 177

主体自觉是宗教公益事业的核心动力

——以进德公益为中心 魏德东 程 玉 197